

◆ 安庆旧影

怀宁县令赵仁基的治水策略

何诚斌

长江水患一直牵动着当政者的神经，对地方官员更是造成很大的压力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，赵仁基（1789—1841）从泾县调到怀宁任县令，当年就“发大水”，灾情特别严重。

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巡抚邓廷桢奏报，五月至八月，“沿江各州县低洼地亩均被漫淹”，至八月初八日，“节交白露已逾旬日，江潮有长无消，加以连日阴雨，较前益增泛涨”。怀宁、桐城、芜湖和繁昌等县圩堤陆续被水冲毁。本年安徽受灾地区多达39个州县卫，占全省州县数的七成多。“逮癸巳（1833）大水而后，无岁不荒，无县不饷，以国家蠲减旷典，遂为年例”。另有李鸿章奏称：“夫癸巳以前，一、二十年而一歉，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。”

赵仁基是江苏武进人，他第一次亲历这么大的水灾，很震惊，组织抗洪救灾时，深感民生之多艰。他查看卷宗，发现道光三年（1823）也曾发大水造成严重灾情：五月，潜山等县被淹，藩司徐承恩带银4000两，陶澍带银4000两，分两路前往发放。七月，经奏准于藩库贮存正项下拨银130万两备用。九月，勘定成灾分数，按成灾分数给赈。因米价渐贵，又于藩库动支银两，派员前赴四川、湖广、江西等省买米10万石，不敷即在该省就近动借。安庆府同知陈其松前往四川，州同万年淳前往湖广，凤阳府同知曹攀华前往江西，各领银2万两，分投采买，照例免税。四川总督陈若霖恐安徽委员自行采买不免遇奸商抬价，即指定地区采买，先后买米4万石……

赵仁基面对历年水患记载，不由得思考起来，长江水灾频发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有人对他说，发大水就是“蛟蛟”，是蛟发威引起的。赵仁基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蛟居在深山中，感风雨而发，它的力量足以崩决大山，破坏川谷，掀起的巨浪有数丈高、千里远，它由小溪入大河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一只蛟弄起的水，流到长江里，如同毫末，微不足道。如果是千百只蛟同时发威，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们不会同时出生，也不可能同时聚集。山里爆发洪水，其势汹涌，老百姓恐惧，以为是蛟，实际上哪有什么蛟。”

有人对赵仁基说，我们这里发大水，问题出在下游，长江入海口太窄，使得大海吸纳不了江水。赵仁基也不认同这种说法。他说：“海为百川所归，海水或高，则江流不纳，坐致壅溃，于理最近。然既由海水不纳，则江流入海之处，必先受病；滨海居民，当早被淹。下游未淹，何至上游先受其害？且频年江水骤发，皆先闻豫章汉阳大水，次至皖江，及皖江淹，而金陵瓜步以下，尚不闻有水患，迟之又久，始与上游相同。此可知患不起于海水，非熟察情势，乌能知之？”（《论江水十二篇》）



那么，长江水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赵仁基认为，百姓开山造田，破坏植被，水土流失，泥沙垫高河床是其重要原因之一。他说：“然山未垦之先，所生者树木，所积者草茅，盖有洪荒至今未尝开辟者。今将垦而为地，

以种芭芦薯芋之属，则必锄削其树木，诛夷其草茅，使草尽土见，然后可以惟吾所植。山势既陡，略无平行，设遇霖雨，则水势建瓴而下。草去土浮，挟之以行。溪谷之闲，水皆赭赤。势既湍急，旦夕千里。泥沙所至，不期自远。故晨居山陵之颠，夕已达于江河之内，充类之尽，不至陵谷互易不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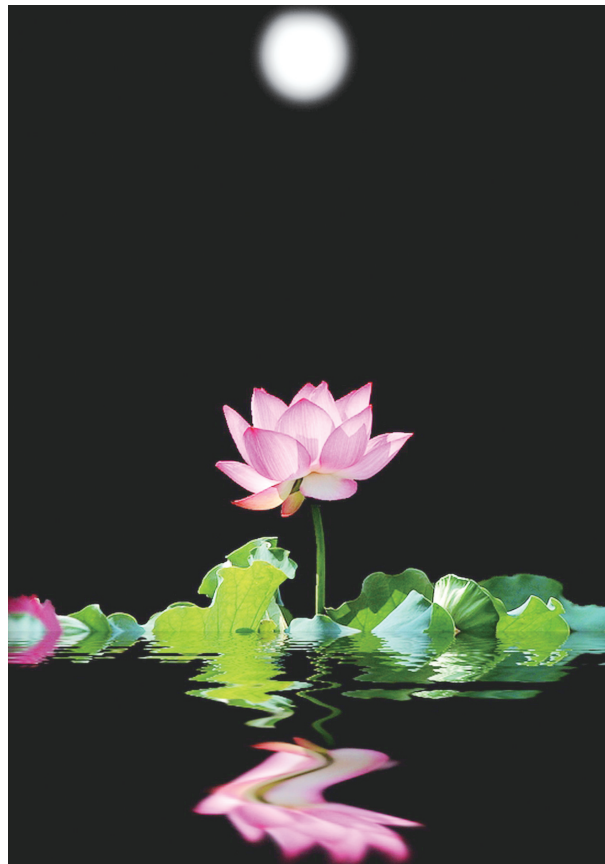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既然所谓自然灾害而非纯粹的自然现象，还涉及社会与人为因素，那么如何来治水呢？赵仁基由此提出，减灾的有效途径包括两方面：一是采取工程和技术措施加以防范自然灾害；二是调整国土开发和加强管理以适应自然规律。《清史·水利志》载：“时人赵仁基以为江之变非一日之变，治江应治其本，治江及治灾并举。其一：广湖潴以清其源，永禁私筑，已溃之坑，不许修复，勿复与水争地。其二，防横决以遏其流，为浚江、筑堤束水使深。”

赵仁基在《论江水十二篇》中提出治江策略：“曰移灾民以避水之来，是以筹度隙地，以置灾民，给予恒业，为转移灾民之术。曰豁田粮以核地之实，为核计洪水屡浸之顷亩，蠲免其课，停其灾赈，便民迁移。灾民渐少，赈赏可停。此裁制国用自然之势也。”殊不知，落实起来很难，怀宁县洪铺镇“道光水文碑”成为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安庆大水灾的物证，水患问题仍没能得到解决。

赵仁基任怀宁县令时间不长，未满一年。道光十三年，对他来说人生意义重大。不仅因“大水”而触动，在两年后为中国水利史贡献出一部极具价值的著作《论江水十二篇》；还在这一年，也因“大水”而意外地被快速提拔。清代薛福成《庸庵笔记·轶闻·县令意外超迁之喜》记载：“道光十三年，（赵仁基）以捕获桃源掘河奸民陈端，优诏褒勉，赏戴花翎。”

原来，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夜，江苏淮安府桃源县（今泗阳）监生陈端、陈光南、刘开成及生员陈堂等为了“放淤肥田”，盗决了桃南厅于家湾的黄河大堤。这既加剧了当年入夏以来淮扬一带原本就雨水过多而造成的灾情，还对清王朝的槽运构成了直接威胁。道光帝得知后龙颜大怒，亲自安排人选办案、审案，并多次下谕催办。陈端感到这件事的性质严重了，惶惶不安，连忙抛弃妻子女，潜逃到怀宁乡下。他东躲西藏，到了秋天，却被赵仁基手下的衙役捕获了。道光帝下旨召见赵仁基，赏戴单眼花翎，并授予滁州知州，数月后即升平阳知府，又数月升江西南赣兵备道，最后升到了湖北按察使的位置。

赵仁基有个儿子叫赵烈文，是曾国藩的机要幕僚。他的《能静居士日记》详细记录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后经过，成为研究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历史的核心资料之一。曾国藩在安庆时，怀宁人马征麟呈《长江图说》，其中提出治江五策：“禁开山以清其源，急疏浚以畅其流，开穴口以分其势，议割弃以宽其地，修陂渠以蓄其余。”马征麟发扬了赵仁基的水利思想，将关注生态环境的“禁开山以清其源”列为首策。马征麟提出，禁止垦殖后由下游受益户对原有山民进行一定期限、一定额度的补偿办法，即“计现在山居民户，责于山水所及及农田之家，均派以平其余，示以年限，俟其竹木树艺之利既成而后已”。可是，推动禁山之策的落实，仍然遇到了国力、技术等方面的制约。



荷塘月色 吴海明 摄

◆ 流年碎影

我与《诗歌报》

朱寿江

四十年前，一份名为《诗歌报》的刊物犹如一颗种子，悄然播在合肥市宿州路9号。那时，它只是一个梦想，一个追求，一个对诗歌无尽的热爱与向往。然而，正是这份热爱与向往，让《诗歌报》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壮大，成为了诗人心中的精神家园。

第一次看到《诗歌报》是1985年3月的一个下午，时任国企负责人的我接待完一批客人，在办公室稍作休息，顺手拿起文员送来的一份《诗歌报》阅读，疲惫顿时一扫而尽。每一首诗歌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，或深情款款，或豪放不羁，或含蓄内敛，或直白热烈。我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沉浸其中，为诗人的情感和诗意的韵律而心潮起伏。

《诗歌报》创刊于1984年，对开四版，既有中外诗坛的重要新闻，也有诗人的动态和诗歌信息，当然少不了诗歌作品。当时的主编是著名诗人严阵老先生，他严谨务实，《诗歌报》的质量和声誉有了质的提高，很多全国知名诗人在《诗歌报》发表作品，让我看到了诗歌的广阔世界和勃勃生机。

我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，虽然达到录取分数线，由于没有经验，填报一个名校中文系，未被录取。1978年参加招工，分配在公社任粮管员，虽没了上大学的念头，但爱好文学之心始终未泯。1986年我参加了成人高考，有幸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，在参加带薪半脱产学习期间，学校借租合肥市委党校一栋教学楼作教室和宿舍，每晚下自习课后，逍遥津公园是我们必去的地方。1987年仲春，在看到逍遥津公园的几十棵梨树花盛开时，我即兴写了一首《梨树花开逍遥津》的诗，在学校图书馆找到《诗歌报》上地址，寄平信到宿州路9号。9月初开学回学校，传达室大爷来到班级把一封印有《诗歌报》字样的大号信封交给我，拆开一看，我的诗歌被刊发在7月6日《诗歌报》第四版右上角，随信附有一张3元的稿费汇款单。晚自习后全班同学围过来要我请客。虽然3元钱的稿费还没到手，但我花了8块钱在淮河路夜市摊请大家吃了馄饨。

《诗歌报》早已转身成为《诗歌月刊》，它们见证了无数诗人的成长与蜕变，也让无数读者感动于诗歌的力量。

如今，我已是两鬓斑白、年过花甲，但我对《诗歌报》《诗歌月刊》的感情却依然如初。它们不仅仅是一份报纸或杂志，更是我青春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退休后，我重拾瘦笔开始尝试写诗。每一次提笔，我都会想起《诗歌报》上那些优美的诗句，它们让我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。